

疫情期间,导演贾樟柯没闲着,在家拍短片、写作,给上海大学温哥华电影学院的学生们上网课

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副刊记者专访贾樟柯,聊聊读书特别是青少年时代读书对自己人生的巨大影响,谈谈疫情对电影产业的冲击和可能产生的变革,以及疫情期间的思考

本报记者王学涛

“通当为大鹏,举翅摩苍穹。穷则为鹪鹩,一枝足自容。”导演贾樟柯用白居易的诗句表达自己在疫情期间的感想。他在家拍短片、写作,给上海大学温哥华电影学院的学生们上网课。

同时,他也期盼疫情早日结束。“从人山人海的柏林电影宫回到自己的居所,仿佛是一个蒙太奇,对比出了不同的生活方法。我上网、刷微博、看微信,没过几天也开始厌倦了这样足不出户的生活。像一只终日游荡街市的狗,突然被关进了笼子,终究会是想念街道的。”

读书:心中有底,走得踏实

贾樟柯在山西省吕梁市的汾阳市长大。小时候,他特别喜欢古诗词,父亲就从县城里(当时还是汾阳县)的新华书店给他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唐诗、宋词、散文等。他会用旧报纸、旧年历包上书皮,除自己读外,还会分享给更多人。“虽然那时候图书资源非常有限,也不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但是读书的渴望,对书和写作的敬重是骨子里面存在的。”他说。

上了高中,汾阳中学的图书馆藏书比较丰富,尤其是杂志和报纸。那时候他常去两座“图书馆”看书:一座是汾阳中学的图书馆,他在那里度过了3年非常愉快的高中生活;另一座是街头的小书摊。每到周末,他便去帮一个高中同学看家里的书摊,顺便读《收获》《十月》《人民文学》等文学杂志。

在书香文字里,他开阔了视野,也开始理解现实。中学时代,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对他影响很大。那时候他是城市户口,贪玩,喜欢看电视、踢足球,但身边从农村来的同学却非常用功,他们晚上常常点蜡烛学习到很晚。刚开始他并不是很理解,直到看了《人生》,突然领悟原来当时户籍阅读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这么大。“严肃文学和阅读,让一个懵懂的少年有了反思社会、人的可能性。”贾樟柯说。

因为父亲在当时的汾阳县志办工作,这让他有机会读到有关汾阳历史的文章,了解汾阳的过去和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的变迁。通过阅读,他知道了汾阳中学洋楼的来历,了解到汾阳的菜、汾阳的第一台洗衣机等。“当你穿行在城市老房子里,走在土地上,逐渐会获得一种身份认同。读这些文章能让人产生很强烈的文化自信。”

“培养阅读习惯,会催生一个人写作的兴趣和冲动。”贾樟柯回忆说,高中时一场小雨过后,他和同学爬到教育局房顶俯瞰汾阳城,看到房顶上不知谁落下了一本书,被雨水淋得纸张贴在一起。那本书是一本滕胧诗选,里面有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诗稿。这本小诗集让他读得热血沸腾,虽然不太明白在讲什么,但里面的诗句和现代中文的美感让他读完后,坐下来、拿起笔、摊开纸,要写一首诗。他们十几个男生还组成一个诗社,每个人坐在课桌前开始写诗,从一个阅读者变成一个表达者、一个抒情者。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后,人的内心开始变得细腻、敏感,对情感、社会、生活的关注,逐渐变成一种自觉的意识。

23岁时贾樟柯考上北京电影学院,27岁拍出了《小武》。曾有记者问他,从偏远的吕梁山来到北京在电影界打拼,有无感到压力和自卑时,贾樟柯说:“当你将表里山河5000年历史装在心里时,你确实心中有底,走得踏实。”

谈到文学,贾樟柯欣赏一个观点:文学是人类的信使。作家发现新问题后,通过文学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所以人们阅读文学,能快速理解生活中发生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因此,他认为文学是我们了解自己、时代、社会非常重要的窗口。

另外,贾樟柯说,我们正身处碎片化的信息时代,人们每天通过网络、微信、微博获得大量信息,



余华(左)和贾樟柯。(受访者供图)

但这些信息是零碎的,这在传播学里叫“信息的迷雾”。但文学有整体性、逻辑性,它能通过文字描述把内在的情感、逻辑梳理清楚,因此,文学作品能让我们获得一种整体性思维的能力,开阔眼界。

“我一直信奉愉悦阅读,遇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有的书读不下去了就放一边,过一两个月、一两年拿起来接着读,都无所谓,读书不是刻板的,而是日常、随意、轻松的事情。”贾樟柯说。

疫情:或许在创作上孕育着新的浪潮

草地:疫情期间您在做什么?

贾樟柯:主要是在改《在清朝》,因为写了十几年,一直想拍成电影,现在又有了新的想法,于是拿出来再改一改。我对写作环境不太讲究,办公室、家里、闹腾的地方都能接受。疫情期间在家待着,有了一个很好的安静的写作环境,这也让枯燥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还是很享受的。

草地:您怎么看这次疫情对电影行业的影响?

贾樟柯:电影行业在疫情期间受到很大冲击,特别是电影院。疫情期间,电影院无法开业,把一年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黄金档——春节档和情人节档失去了,如果了解电影市场情况的话就会理解,很多影院全年三分之一的收入是靠春节这段时间,现在很多地方也在出台政策进行扶持。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大部分的拍摄停了下来,这是一个显性的影响。同时,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电影人,特别是创作者,一个暂缓、停下来反思、重新出发做准备的契机。

我相信,这样一个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一定会给人们带来非常多的对于社会、人、生命的新思考。有朝一日疫情结束,电影创作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发展。大家会带着新发现投入创作中。这两天上网课,我也鼓励学生们——从电影史的角度看,电影导演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历过战争的,一类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二战结束后,这样的人类浩劫带给电影工作者非常多的创作动力,所以产生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关注底层民众和现实生活。或许将来我们会发现导演分为两类:经历过新冠肺炎疫情的和没有经历过的。这对我们全面地理解一些重要的文化问题是一个契机。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在创作上它孕育着新的浪潮,或者新一代导演、创作者。

草地:疫情对您的电影发行产生了什么影响?

贾樟柯:直接受到影响的是两部影片。一部是由我自己导演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原来计划2月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3月底4月初发行。但疫情发生后,发行就取消了,之前准备工作只能停止,等影院恢复后,我们会重新考虑在一个恰当的档期来发行。说实话,疫情对影片宣发造成了很大的投资损失,很多准备工作都需要有投入的。另外一部是我们公司出品、由我监制、年轻导演宋方执导的《平静》,原来也安排在春节进行商业发行,如今取消了。

现在电影界有一个新的尝试,一些影片选择流媒体公司直接网络播映。这个有好有坏,好的是给枯燥的生活带来丰富的片源,让大家在家里看到更多的新电影。不好的是,很多电影是为大银幕构思的,导演还是首先希望能在大银幕放映,之后才是流媒体。我们这两部影片也是为了大银幕进行创作的,所以还是希望等一等,待疫情结束后再宣传发行。

草地:那对在山西举行的吕梁文学季、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影响呢?

贾樟柯:吕梁文学季原来是希望在“世界读书日”举行第二届,目前也延期了。我们各项筹备工作都做了很多,评审工作都结束了,随时可以召开,就看疫情变化。另外,原定于在10月10日开幕的平遥国际电影展目前进展顺利,整个策展团队、选片团队、活动统筹团队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往前推进,我们对平遥国际电影展能如期进行有信心。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海水版的“愚公移山”

草地:这部纪录片融合了您关注的“变迁”“故乡”“文学”“作家”等关键词,创作这部时间跨度达70年的纪录片,初衷是什么?

贾樟柯:这个片子跟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有些关系,在那样一个庆祝的氛围里,我觉得自己一直想拍的“艺术家三部曲”可以完成最后一部了。2006年我拍了第一部关于著名画家刘小东的影片《东》,第二部是2007年拍的关于服装设计师马可的《无用》,这两部影片拍完后,我一直希望能完成第三部。随着时间推移,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突然想去拍文学家,因为我们的社会经历了非常大的转变,这期间个体经历了什么,需要有一部影片来讲述。另外一个思考就是当下城市化

进程非常迅速,过去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国家,城市化之后呢,实际上我们过去很多生活经验、经历还在影响着今天,我们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和生活,需要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回到农村,了解我们过去生活的形态。

草地:《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聚焦农村,为什么没让农民群体作为“历史的证人”,反而聚焦到了作家身上?

贾樟柯:最初影片名为《一个村庄的文学》,因为文学家长期进行文字表达工作,他们对生活有超强的感悟能力,也有超强的讲述、表达能力。影片通过4位作家马烽先生(已故,由其女儿回忆)、贾平凹老师、余华老师、梁鸿老师,来讲述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经历。我是1970年出生的,有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那就是改革开放。当然,我也是带着对不熟悉时代的好奇去拍片子的,比如说马烽所处的时代,他们具体经历了什么?这也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它能够打开未知的领域。作家通过充满细节的讲述,带我们重新理解曾经的生活方法、经历过的问题。这是文学和艺术都在做的一个工作。

草地:不少看过电影的人夸余华老师把故事讲得生动有趣,您是否认为在访谈类的纪录片中采访对象的性格很重要?

贾樟柯:我们最初的拍摄计划有一个很长的名单,优秀作家非常多,为啥最后聚焦在这4位身上?因为他们都有农村和小城市生活的经验,而且他们都非常开放,愿意把私人的经历拿出来分享。另外他们的性格是有差异的,余华老师幽默,所以他的段落非常活跃;梁鸿老师细腻,因此她讲述的家庭部分比较动情;贾平凹老师的讲述本身就是史诗,他的状态平静如水,但讲述的内容万马奔腾。

作家完全不同的气质,让影片充满了不同的色彩,如何做到这一点跟我们在脚本、拍摄上的准备有一定关系。《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我第一次有脚本的纪录片拍摄。人们在回顾过去生活时容易夹叙夹议,以议论为主,有较多的感悟,但对电影来说,最主要的是生活细节、情节的描述,只有这样才能让年轻一代进入到历史的语境中,进入当时生活的质感中去体会我们几十年的经历。

草地:《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样一个浪漫

和富有诗意的影片名有何深意?

贾樟柯:这部影片共分18个章节,涉及每个个体在漫长的时间进程中,面临的问题、解决掉的问题、仍在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章节叫“吃饭”,我们在拍摄山西汾阳贾家庄(马烽先生的众多重要作品诞生地)的村民时,他们同时指向了解决吃饭的问题。新中国成立70多年,其中一个伟大的成就就是它,你只有跟这些经历者交流时,才能感受到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还包括人类一直有的问题,比如“病”“恋爱”等。到影片最后我发现,这四人实际上讲述了中国社会生生不息往前走的一个内驱动力。

在一个很偶然的时机,拍摄余华老师的时候,他讲到了自己小时候游泳的故事。说他小时候看见大海是黄色的,课本上却说是蓝色的,所以梦想能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地方,我们就把影片名《一个村庄的文学》改为了《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名字,“一直”代表着历经挫折,“游”代表着持之以恒,“海水变蓝”代表更加美好的理想社会。我跟同事讲,如果经典的“愚公移山”是一个关于山的故事,那这是海水版的“愚公移山”,它们在精神内涵上是一致的。

草地:您说过年轻一代的城市经验越来越多,农村经验减弱了,所以有必要拍摄一部电影来谈乡村记忆与我们的关系,那么,您认为“农村经验”对年轻人有何意义?

贾樟柯:如果我们去了解过去的农村,了解出发点,我们会有更多对国家发展的耐心和宽容。另一方面,农村生活也代表着一种传统的人际关系,比如说血缘关系、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的注重。生活在农村是生活在一个密集的人际关系中,但到了城市,可能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亲戚,为什么我们有时会感觉到孤独,感觉在繁华中的无依无靠,它跟我们失去这种关系是有关联的。如果我们理解过去乡村生活的话,我们也会理解今天生活的情感关系。

其实城市是相对于农村的,如果没有农村就没有城市这个概念,我们去谈论城市的时候其实应该去谈论农村,我们在谈论农村的时候其实更主要的是在谈论城市,他们互为因果。所以对于一部谈论乡村生活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也是一部谈论城市的电影。

(上接12版)

深受感动的孙中山命胡汉民写信表示感谢,并陈述起事经过。那人的回信却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若既能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篇小说。”

这个慷慨赞助革命的商人叫张静江,他来自南浔,是四象之一张颂贤的孙子、张石铭的堂弟。

1902年,张静江因缘际会,以商务参赞的身份成为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部下,离开南浔,前往法国。当时,同为孙宝琦随员的,还有后来与张静江齐名的李石曾。到法国后,李石曾意在读书,张静江则显露出商人世家的旨趣,意在贸易。他弃官从商,以侨商身份留在法国。一年后,经过详细市场调查,张静江创办了通运公司。

通运公司最初的业务与南浔有直接关系:出口生丝和茶叶。后来,慢慢发展到绸缎、地毯、漆器、竹器、古玩、字画、玉器、瓷器和青铜器。通运公司发展迅猛,很快在纽约、伦敦和上海成立了分公司。其“获利之巨,无法估计”。经商之外,张静江还发起和筹办了留法、留英俭学会;创办《新世纪》杂志,出版《新世界丛书》。

尽管多次资助孙中山和革命党巨款,但很长时间里,张静江竟然没有加入同盟会。其原因,在于特立独行的张静江对同盟会盟书里的“当天发

誓”字样不以为然。当冯自由和胡汉民邀请他入会时,他提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信天,如果同意我不用“当天”二字,我才能加入。于是,向孙中山请示后,张静江成为仅有的例外。

张静江加入同盟会后,为革命筹款的任务几乎天经地义地落到了他头上。每逢要用钱,孙中山总是向张静江伸手,张静江也总是竭尽所能地筹措。但是,要推翻一个垂而不死的大帝国所进行的武装起义和地下斗争,所需的金钱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便是亿万富豪张静江也渐渐难以为继。为此,他先是卖掉了经营良好的通运公司,后来又卖掉了上海滩的五栋别墅。

在公司和别墅都卖掉以后,这个曾经的大富豪竟然囊中羞涩。为了帮孙中山筹款,他只好向其堂兄张石铭借钱。第一次,张石铭很爽快地把钱借给了他。没过多久,他又第二次上门。张石铭觉得即便是办公司血本无归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花完了,加上听到社会上关于张静江暗中资助“乱党”的风言风语,张石铭予以峻拒。两兄弟越说越僵,张静江竟然从怀中掏出手枪,威逼堂兄又一次借钱。此后,张静江通过各种手段,把包括他的哥哥、舅舅在内的诸多有钱的亲戚都吸收到同盟会中,成为革命党的筹款对象。1920年,在孙中山授意下,张静江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其目的也是为当时的国民政府筹集经费。证券交易所赚的钱,大部分送到了广州,交到孙中山手上。



▲始建于明代中叶的浙江湖州南浔“百间楼”是江南保存最完整的沿河古民宅群。新华社资料片

据不完全统计,张静江赞助革命的银两总数超过110万两,相当于今天两三千万美元。

孙中山为此感慨:“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民国后,为了报答张静江,孙中山拟请他出任财政部长,张静江却坚辞不就。到二次革命期间,当下野的孙中山处于风雨飘摇的劣势时,又邀请张静江

出任革命党财政部长,这一次,张静江欣然答应。拒绝锦上添花,热心雪中送炭,张静江品行之高洁,由此可窥一斑。

孙中山对张静江毁家纾难式的汗马功劳胸中有数,他一直把张静江视作最心腹的密友,他告诫党内同志:“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

在南浔镇的张静江故居,有一副孙中山手

书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那是1923年,张静江因病回南浔休养时,孙中山特意介绍了一位德国名医前往南浔诊病,并托人带去这副对联以示慰问。

对另一位重要历史人物蒋介石,张静江则有知遇之恩。蒋介石在陈英士手下时,张静江很赏识他,经常接济其生活,并资助他去日本深造。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元帅后,张静江把蒋介石推荐给孙中山。后来,正是张静江的力荐,蒋介石才得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要职。

张学良易帜后,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并成立了建设委员会,张静江任委员长。新建首都电厂、威墅堰电厂、长兴煤矿、淮南煤矿;兴办了国际无线电台、江南汽车公司、江南铁路和淮南铁路。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这些能源和交通方面的建设,无疑是一次次重要输血。1938年,当日军进逼南京时,张静江由汉口转香港赴瑞士养病,结束了他的建设委员会委员长生涯。十年间,张静江仅用十几万元公款,就为国家创造财产超过五千万万元。

……

繁华事散逐香尘,南浔既是一座蚕儿吐出的江南雄镇,又是一片从丝出发的人文福地。以蚕桑为龙头支撑起的兴旺与富足,百年后仍然能找到当年的佐证。那些雕栏玉砌的豪门大宅,那些曲径通幽的藏书楼,那些隐约尚存的优雅气质,无不传达出一个逝去时代的温暖。